纵览历代文化名家笔下普陀山之意境

□周开龙

观望世上著名风景名胜，无不兼具自然形胜与人文诗意，文化正是山水胜境的灵魂。孤悬东海的普陀山，不单凭借山海奇观名扬海内，更因千百年间大批文化名家渡海登临、吟咏题跋，层层积淀，赋予这片海天独有的精神神韵。自唐迄民国，文士、名臣、书画家、学者接踵而至，或以诗文描摹山海壮阔，以笔墨抒写海山清宁；或以史笔阐扬人文教化，融儒者情怀于潮音松壑之间。他们留下的诗词碑记、摩崖题刻与序跋文章，既是对普陀山风物的生动描摹，更是多元思想交融的重要载体，为普陀山文旅积淀了丰厚绵长的人文文脉。



一瓦青苔，藏尽普陀山的光阴　摄影：洪波雷

唐　赞文传圣德，海山启文缘

唐代是普陀山人文叙事发轫的时期。在这一草创阶段，中土文人便以赞文体书写观音圣德，王勃《观音大士赞》便是代表性名篇。唐咸通四年（863），日僧慧锷携观音造像留驻梅岑，“不肯去观音”的传说落地梅岑，开启普陀山的圣山文脉。

王勃作为初唐文章巨擘，虽未曾亲临东海海岛，却以华美典雅的骈文作赞，铺叙观音济世之德：“南海海深幽绝处，碧绀嵯峨连水府，号名七宝洛迦山，自在观音于彼住。”将补怛洛迦的圣地意象定格于苍茫沧海之上。这类赞文在唐代广为传诵，构建起洛迦山与观音的文学想象，为后世将普陀山认定为洛迦圣地，埋下文学与人文叙事的伏笔。

唐代相关文字重在文化意象的奠基。彼时渡海登临留题者尚不多见，但以王勃《观音大士赞》为代表的文学作品，在文本之中塑造出“海上洛迦、圣者栖止”的文化图景。待到慧锷留像梅岑，传说叙事与文学意象两相契合，普陀山逐步由东海荒岛，转化为世人心中的海上圣境，亦为宋代文人登山咏海拉开序幕。

宋　海山营胜境，儒心对沧溟

宋代，普陀山圣山格局逐步成型，浙东士大夫纷纷渡海访胜，将家国襟怀、修身感悟融入这片海岛胜境。

王安石任职鄞县期间，渡海游览洛迦，写下《游洛迦山》：“山势欲压海，禅宫向此开。鱼龙腥不到，日月影先来。树色秋擎出，钟声浪答回。何期乘吏役，暂此拂尘埃。”诗人以经世理政的视角，描摹山海压浪、殿宇临海之景。钟鸣与潮响彼此呼应，在苍茫壮阔的海景里，安放仕宦生涯中片刻的安宁，写出山海相依、尘外存境的独特气质。

南宋陆游两度登临普陀山，留下《好事近·登梅仙山绝顶望海》：“挥袖上西峰，孤绝去天无尺。拄杖下临鲸海，数烟帆历历。贪看云气舞青鸾，归路已将夕。多谢半山松吹，解殷勤留客。”放翁胸怀报国之志，登高望海，眼前浩渺沧海、云气变幻，胸中尽显旷达胸襟。他笔下的普陀山，不只是一方灵境，更是能够承载志士情怀的云海仙山，将儒家浩然之气，与海岛空灵景致融为一体。同期史浩留下篆书“真歇泉”摩崖石刻，以金石笔墨记录泉石清幽、隐者栖游的意趣，开创普陀山摩崖题刻的人文传统。

宋代名家的书写重在铺陈山海格局：汪洋大海为底色，殿宇嵌于崖岸，儒者登高观海，于沧海之间体悟天地大道，奠定普陀山诗文“大景含心境”的基调。

元　笔墨绘补陀，书画载人文

元代书画大家赵孟頫、管道升夫妇，兼通典籍，为普陀山留下珍贵文献。赵孟頫《游补陀》，以清雅文字描摹补陀洛迦海山胜境；夫人管道升编撰《观世音菩萨传略》，梳理观音化现故事，把慈悲济世的叙事，以文人典籍的形式流传，推动圣山文化与士大夫审美相融。元代盛熙明撰《补陀洛迦山传》，以儒史笔法记述山境源流，并非单纯的僧门传记，而是以士人视角，将普陀山纳入中华名山史传体系，为后世山志的编纂确立书写范式。

元代名家重在文图互证，书画与典籍并行，把普陀由一处海上灵迹，化为可供文人品读、载诸史册的文化圣地。

明　三教汇海天，诗文镌崖石

明代是普陀人文创作的鼎盛阶段。海防儒将、翰林文臣、书画戏曲名家相继渡海，或纂修山志，或题写碑碣，或赋诗抒怀，三教兼容的思想在诗文石刻之中充分彰显。

侯继高、屠隆主持纂修《补陀洛伽山志》。屠隆在山留下多篇颂文题咏，作《补陀观音大士颂》，以文人辞赋叙写慈悲济世的本怀，倡导三教融通。侯继高身为海防总兵，其文字之中，普陀兼具海防形胜与海山清境，将守护海疆、护持文脉的经世思想融为一体。周应宾官至礼部尚书，主持重修山志，提出“非惟无妨于儒，亦足助儒教之所不及”，其诗文与志书序言，是浙东儒者观照普陀圣山文化的核心表述。

书画大家董其昌寓居白华庵，为妙庄严路撰写碑记，题写“入三摩地”摩崖。书法苍静简远，文字清幽隽永，至今留存于妙庄严路入口。在董其昌笔下，普陀山的神韵藏于石阶、松风与海潮之间，漫步山径即是观照本心，将山水游览升华为心灵体悟。汤显祖游览磐陀石，写下《磐陀石上看日出》：“磐陀石上暗飞霜，吹入香炉作道场。破衲睡来天镜晓，清辉五色在扶桑。”捕捉磐陀观日、海天焕彩的刹那光景，霞光奇石相融，自然奇景与空灵心境合而为一。

明代文士笔下的普陀山，一面记录山川建筑，一面在诗文石刻中阐扬神道设教，把海防治理、士大夫修身、劝善教化熔铸于海天图景之中。

清　潮音伴吟咏，朴学证山史

清代浙东史学、朴学兴盛，文人游山，兼顾审美吟咏与文献考证。裘琏、秦耀曾等浙东学者受聘纂修山志，除诗文创作之外，更加注重史实考订。

祝德风撰《普陀全胜》，属于私家著述，一景一诗，融山水审美、朝山揽胜、儒者静观于一体。诗作描摹普陀十二景、奇石幽岙，文字清雅，是儒士游山、以诗存景的代表。另有众多文人吟咏潮音洞、短姑道头，静观海潮澎湃，体悟慈悲济世的人文内涵，将民间流传的向善理念写入诗篇。

清代名家的书写，兼具诗歌的审美意趣与史学的严谨审慎，既有对潮音、云海、莲岛的诗意描摹，又延续浙东史学传统，依靠文献考证，留存山境沿革脉络，令普陀山的神韵，既有空灵诗意，亦有厚重史实支撑。

民国　新旧交汇，海山存清境

时至民国，新旧学术思潮交融碰撞，文化名家游山题咏，观察视角随之更新。康有为《游普陀题》：“观音过此不肯去，海上神山涌普陀。楼阁高低二百寺，鱼龙妄卷万千波。云和岛屿青未了，梵杂风潮音更多。第一人间清净土，欲寻真歇竟如何。”以开阔雄浑的笔力，铺叙殿宇连绵、海涛奔涌的景象，点出“不肯去观音”这一核心文化母题，将普陀山定位为人间清净之境。

新文学大家郁达夫渡海访山，写下《游普陀作》：“山谷幽深杖策寻，归来日色已西沉。雪涛怒击玲珑石，洗尽人间丝竹音。”全诗落笔于梵音洞惊涛击石，海涛涤荡尘嚣，把山海自然之力写得极具张力，褪去繁缛的说教，以现代文人的审美，体会海山涤荡尘烦的意境，自然风物与内心澄宁两相呼应。

丰子恺追随弘一法师，多次登临普陀，作《佛顶山》：“一别名山五十春，重游佛顶喜新晴。东风吹起千岩浪，好似长征奏凯声。”作为现代艺术大家，他的诗作简约质朴，观海山风云，寄寓对世间太平的期许，将书画美学、人文悲悯融入海岛风光之中。南社爱国诗人柳亚子亦有《游普陀》绝句：“追暑莲邦昔未曾，乘风破浪我何能。金闺国土终堪念，胜礼慈云十丈灯。”于山海之间寄托家国情怀，文人游山不再仅仅流连泉石，而将时代忧思注入海天吟咏。

与此同时，王亨彦承定海黄氏朴学一脉，编纂《普陀洛迦新志》，以儒生史笔考辨文献；尘空法师撰《普陀山小志》，以近代史学视角记述山境文脉。一儒一僧，两套书写范式并行，延续千年名家写山的传统，也开启现代学术视野下普陀文化的阐释路径。民国诸家，或为旧学宿儒，或是新派文人，新旧文风交汇于莲岛，古典山海意境之中，注入近代人文思考，为普陀诗文文脉画上承前启后的一笔。

当然，在当代也有不少文化大家参访普陀山留下了经典的诗赋名篇，极大地丰富了普陀山的文化底蕴。纵观历代名家诗文题跋，他们笔下普陀山的意境，可归纳为三层内涵：其一，山海之雄，孤岛浮于东海，潮起潮落，云生崖壑，是独属于东海的自然气象；其二，心境之静，殿宇依山而筑，钟鸣伴潮，慈悲向善的理念浸润一山一海；其三，儒境兼容之厚，浙东文人秉持经世、仁民之心观照这片海山，借诗文、碑刻、方志，将普陀人文叙事纳入华夏文化体系。

一代代名家渡海而来，以诗文为舟，笔墨为证，将个人襟怀、时代思想，镌刻于普陀山海之间。这些诗文碑记，不只是描摹海天胜境的外在风貌，更沉淀出海山相依、三教兼容、慈悲济世的文化精神，为普陀山文旅发展储备了丰厚珍贵的人文宝库。

